

中国肃毒问题的多维透视

Thoughts on Banning Narcotics in China

韩朝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北京 100836)

从 50 年代至 70 年代, 中国大陆基本禁绝了毒品, 以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 中国社会各方面对毒品问题都极为陌生。但自 80 年代起, 毒品问题在中国重新抬头, 使得研究毒品问题和肃毒政策再次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中国的毒品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内涵。但它从来都是一个国际性问题, 历史上如此, 现在仍然如此。因此, 研究中国的毒品问题不能将眼光局限于中国国内, 必须放眼全球, 从国际毒品产业的总态势出发构思中国的肃毒方针。同时, 也需要注意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本文即打算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肃毒的难点, 以期有助于对问题的全面认识。

一、毒品流传和泛滥的根源在于贫困吗?

在肃毒研究中有一个流行观点, 即毒品的泛滥是贫穷的产物, 因而禁毒的根本在于发展经济, 摆脱贫穷。但仔细分析一下, 会发现实际情况很可能正好相反, 即毒品泛滥是富裕社会病的表现。

翻开世界地图一看便知, 世界上的毒品产地都在不发达地区, 而毒品的销地却集中在发达地区。缅甸北部的佤邦控制区是世界主要的毒品产地之一, 该地区总面积 1.7 万平方公里, 人口近 40 万。该地区的鸦片种植历史已有 100 多年。目前, 这一地区每年种植罂粟上百万亩, 占其可耕地面积的 80% 以上。佤邦地区年产鸦片约 1 000 吨, 占“金三角”地区的鸦片总产量的 70%。从社会发展程度和人均收入水平来看, 这一地区至今仍很落后。若毒品泛滥的根源在于贫穷, 那么这一地区的多数居民都应成为吸毒者。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 这一地区出产的毒品很少被当地居民消费, 大部分被加工成海洛因, 经泰国和我国销往世界其他地区。而且, 从我国有关方面的调查来看, 在佤邦地区, 鸦片并不是消费品, 许多当地农民甚至不知道鸦片的真正用途, 只知鸦片好种, 好管, 能卖好价钱。目前, 整个

佤邦地区, 吸海洛因者仅为 500 人, 抽大烟者不过 3 000 人, 后者仅占其总人口的 0.35%。与此相对, 中国的思茅地区从 80 年代初再次流传毒品起, 至今已对 28 639 人实施了戒毒措施, 目前全地区内尚有 8 392 名吸毒者。同样, 美国不出产鸦片, 但在 70 年代, 仅官方统计的吸毒上瘾者即占其总人口的 0.1%。当今世界上, 毒品的主要销售市场都在欧美等地的发达国家。而且, 在发达国家的某些高收入阶层中, 如医生、体育明星或娱乐界明星中, 吸毒上瘾者的比例往往高于一般收入阶层。可见, 毒品问题的出现与生活贫穷并无很大关系。的确, 有许多吸毒者一贫如洗, 但这是吸毒导致倾家荡产的后果, 不是吸毒的前提, 更不是吸毒的充分条件。

毒品价格昂贵, 是典型的高消费产品, 真正的穷人难以问津。据研究, 吸毒的起因大都与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有关。如美国心理学家肯尼思·凯尼斯顿在 60 年代研究过美国大学生中的麻醉品问题。他的结论是, 使用麻醉品的最初动机是自我探索和渴望寻求生命的意义。一些中产阶级的青年人使用毒品是一种反抗社会主流价值标准、肯定自我价值标准的行为。实际上, 往往是富裕但百无聊赖的人, 在某种相应的环境中更容易沾染毒品; 也是那些富裕但缺乏精神感召力的社会, 容易面临毒品的泛滥。而这恰恰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普遍特征。因此, 一般而言, 越是富裕的社会, 越容易形成滋生毒品问题的温床。

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 人均享有的物质财富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社会生活全面商业化和实利化, 理想主义泯灭, 宗教精神式微, 身居富裕之中的人极易产生“生存意义”的困惑和茫然。而激烈的生存竞争和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更使人的内心充满了孤独、焦虑和无助感。这都成为滋生毒品问题的沃土。许多人使用毒品, 不论是否合法, 都是为了享受在服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自我“欣快感”, 这种“欣快感”能使人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焦虑。在 60 年代, 有人对一批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 大学

生使用毒品的主要动机是坚持一种自我“宽松”的伦理观,以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社会习俗和常规,获得新的自由体验。

毒品问题本质上应该是一种社会的“富贵病”。这里的“富贵”当作相对理解,它应该是收入水平与精神寄托间相对关系的一个函数。一些绝对收入水平并不很高,但内心极度空虚和焦虑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染上毒瘾。因此,毒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简单的贫穷或富有,而在于社会文化模式的缺陷。

二、我国目前毒品问题抬头的原由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国当前毒品问题的重新出现始于云南边境地区,尤其是云南的思茅地区。思茅地区毗邻举世闻名的毒品产地“金三角”,与号称“海洛因王国”的原缅甸军事集团控制区接壤,有长达 486 公里的国境线。境内境外山水相连,同文同种,无任何地理、人文阻隔。思茅地区历史上也曾是毒品经济的乐土,直到 1958 年才基本禁绝了毒品的生产和贩运。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有国民党残部在境外活动,为防范他们的骚扰,我方在云南边境实施了严格的经济统制和军事戒备措施。

从 80 年代初起,我国推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境内居民与境外居民的交往日益自由和密切。吸毒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不可避免地传入我国。云南思茅地区处在境外毒品过境转运的要冲,当地居民与吸毒人群接触频繁,加上其它社会因素,导致毒品问题的再次泛滥。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吸毒上瘾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毒品本身的自然特性,也不在于他人的逼迫,而是吸毒者在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下作出的个人选择。美国学者霍华德·贝克尔通过对吸大麻者的研究发现,大麻产生的感觉并非自然就能使人快活,或者说这种感觉未必是令人快活的。人们偏好吸大麻的体验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这与偏好牡蛎或马爹利酒并无本质的区别。这种情况类似于吸烟。初次吸烟的人都不会觉得烟味有什么好,但如果他所处的环境中鼓励、赞赏吸烟行为的规范性因素,而他个人又接受了这样的规范,他就会去努力接受烟味,并学会对烟味持肯定态度。于是,他就逐步变成一个烟民。吸毒同样如此。

贝克尔总结说,一个人要成为吸大麻者,必须经历几个阶段:第一,学会能产生“欣快感”的吸食方式;第二,学会识别这样的感觉并把它与吸大麻联系起来;第三,学会享受这些自以为是的感受。按这样的进程发展下去,人们就能逐步形成想吸大麻的性情或倾向。这种倾向在吸大麻的初期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倾向要以关于大麻的认识为基础。而这种认识只能产生于上述实际的体验过程中。一旦

完成了这个过程,人们就向往并能够从吸大麻中享受快感。因此,吸毒与吸烟、喝酒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它的传播是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学习的结果。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我国的环境中,有几类人群是较容易沾染毒品的。首先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暴富阶层。这部分人大都曾有过坎坷的生活,文化水平不高,致富之后,缺乏高远的生活目标,容易堕入醉生梦死的颓废生活,因而极易到毒品中去寻求解脱。其次是离乡背井、外出谋生的人。这部分人远离熟悉的亲朋好友,流入异乡,往往会感到孤独;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行为上所受的约束也减弱,这时若有适当的外部影响,很容易染上毒品。再有就是青少年。他们缺乏生活经验,好奇心强,又逢青春期的焦虑多发阶段,在一定的外因诱导下,也很容易染上毒品。据思茅地区的统计,现有的吸毒者中 35 岁以下的青年占 50% 以上;在 1994 年新增的吸毒者中,25 岁以下的青少年占 78.6%。这都突出地显示了毒品传播方式的社会性质。

三、中国肃毒的经济难点

现阶段中国毒潮再起的直接原因是来自境外的贩毒。70 年代末,贩毒活动只局限于云南边境地区。但进入 80 年代以来,“金三角”毒品经我国转运国际市场的活动日益猖獗,成为目前我国的主要毒源。因此,设法从根本上铲除境外毒源,成为我国肃毒工作的关键。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产业的存在都不是由供给单方面决定的。首先是市场中出现了持久的需求,社会上才会形成迎合这种需求的供给活动。毒品产业也不例外。

从供给角度看,“金三角”的毒品产业对我国而言是一个毒源,但对“金三角”的居民来讲,却是地区的支柱产业,赖以维生的“衣食父母”。“金三角”的鸦片主产区佤邦控制区,平均海拔 1 800~2 300 米,属高寒山区。低缓的平坝只占区内面积的 1%。绝大多数地区适宜种鸦片,不适宜种粮食。佤邦当局也曾试种过一些经济作物,但由于资金、技术、气候等方面的原因,大都未获成功。佤邦人普遍认为种植罂粟是该地区唯一的资金和劳力投入少、技术要求低、附加价值高的生产活动。因此,从纯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毒品产业在这一地区的繁荣是有其必然性的。

从需求角度看,在许多发达国家,随着吸毒行为在中产阶级中的蔓延,社会对吸毒行为的态度有趋于宽容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研究领域中的反映,就是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常识的研究结果。如一般人往往认为,吸毒成瘾,年长日久,会使人衰

竭甚至致人于死地。但有的研究者却发现,吸毒者并非毫无理性的神经错乱者,他们吸毒的主要目的是享受“欣快感”,并非刻意自我荼毒,因而多数吸毒者对所使用的毒品是有所选择的。有许多麻醉品也能产生与吸毒相同的幻觉效果,但由于它们具有致命的后果,因而并不受吸毒者青睐。而一些对海洛因上瘾者进行了多年观察的学者断言,只要是提纯的海洛因,并在使用中小心地控制使用量,并不会对人造成生命危险,它对人体也无可察觉的危险效果。还有的研究者发现,毒品使用者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使用模式;不少习惯性毒品服用者很注意避免自己上瘾,或只在周末服用;许多瘾君子能控制他们的习惯。

还有的研究者断言,有毒瘾的人在得不到毒品时的确会感到苦恼、烦躁、出汗和痛苦,但这种感觉绝非不可抗拒。他们甚至认为,海洛因上瘾者有办法自我戒毒。吸毒者在戒毒后是否恢复吸毒,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海洛因因使用者所表现出来的许多特征,实际上都是由海洛因的非法性造成的。例如,因只能从黑市上获得海洛因,使得海洛因的质量无法保证,伪劣掺假的毒品泛滥,结果给吸毒者的身体造成严重摧残。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是,美国的医生中吸毒上瘾者的比例为美国总人口中吸毒者比例的10倍,但医生中因吸毒而致衰竭的人显然比其它阶层吸毒者要少。这或许是因为医生较容易通过合法渠道得到麻醉品,因而质量较有保证,或者医生具备的医学知识使他们能掌握吸毒的分寸。许多研究者认为,海洛因要是真的对人体具有明显的危险性,那么除了想自杀的人以外,谁都不会去沾它。

又如,毒品价格昂贵,因染上毒瘾不能自拔而致家财荡尽的人可谓不胜枚举。但毒品生产的成本并不很高,毒品之所以能卖出天价,主要原因在于它被法律禁止,这使制售毒品成为风险极高的行当。因而毒品价格中的绝大部分是对制售毒品者的风险报酬。这样,禁毒的法律似乎倒成了导致吸毒者荡尽家财的直接因素。

这些观点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讲,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实际上,其科学性也是大可怀疑的。在发达国家中,围绕这些观点仍存在着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但有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这些观点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已很有影响。如在美国,研究者们已在性质上将吸毒问题与吸烟、酗酒一类问题等同视之,因而在分析和研究毒品问题时的道德批判意识已大大减弱。这至少表明,发达国家中对吸毒行为的态度有趋于宽松的迹象。受这种倾向的影响,在某些发达国家的法律界高层人士中已出现了毒品合法化的主张。

了解这些动向对我们研究中国肃毒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们意味着,国际市场上对毒品的需求还可能增长,至少不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消退。

将上述国际毒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动向结合起来,就不难看出铲除“金三角”毒源的困难之所在。“金三角”生产毒品,但不消费毒品。毒品产业对这一地区来讲利远大于弊。因此,毒品产业的“利”对于“金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转换来讲,是一种机会成本。“金三角”地区本身对毒品产业并无内在的依赖。只要条件合适,该地区的居民肯定乐于改换经济结构,转营它业。问题是该地区的当局和居民绝不乐意承担这种结构转换的成本。这项成本只能由苦于毒害、要求禁毒的国家来承担。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尽管“金三角”当局的领导人已明确表态:“有外援要肃毒,无外援也要肃毒。”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以肃毒为筹码,与国际上的有关方面就资金问题讨价还价,外援多就少种鸦片,外援少就多种鸦片。

由于世界毒品产地的高度集中,“金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根本转换将使世界毒品市场失去一个主要的供给源。在国际毒品需求不变或增长的情况下,若无新的供给源替代“金三角”,这种产业结构转换将引起国际毒品价格的大幅上扬。而对于“金三角”地区来讲,这意味着毒品产业的比较利益上升,产业结构转换的机会成本增大。换言之,在“金三角”地区铲除毒源的代价要受国际毒品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它将是一种动态成本。于是,便会产生一个疑问,如果“金三角”地区毒品供给的减少引起国际毒品价格的显著上涨,“金三角”地区的领导人和居民是否还会坚持实施结构转换?这恐怕是我国在设计肃毒方针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四、结束语

毒品泛滥与刑事犯罪和社会瓦解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使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对毒品问题放任自流。但肃毒问题的艰巨性又要求每个国家的政府努力探索更有效的方法。应当注意,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禁毒和戒毒措施几乎都未取得显著的成效。

毒品问题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惩治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在了解毒品问题的产生条件和基本蔓延方式后,不难想到,我国毒品问题的特性是有可能发展变化的。如果说,迄今为止我国毒品问题的主要根源还是外生性的,那么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变化,我国的毒品问题很可能内生性,即随着我国社会越来越接近高度工业化社会,现代工业社会所固有的文化缺

(下转第50页)

亿立方米。1986~1990年间,年均增产原油100万吨以上。胜利油田是东营市最辉煌的大型企业,也给现代黄河三角洲带来了现代化的飞跃。1949年,全区工业产值仅15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4%;1990年,地方工业产值已占地方工农业产值的66.9%。1989年,胜利油田用于勘探、开发的建设投资约47亿元,采购物资30多亿元,每年施工面积100万平方米以上,为地方工业的发展和劳动就业开拓了广阔的市场,逐步带动东营市地方工业围绕油田发展成综合工业体系;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312倍。现代黄河三角洲在10年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5倍,建成3000多公里公路,两个海港和一个机场,初具规模的中小城镇拔地而起。一条“开发油气资源→发展石油化工→形成替代产业→走向长期繁荣”的持续发展战略正在推进。1988年,东营市已进入全国18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元以上城市的行列(占第15位),在全国城市5项综合指标(城市结构、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社会秩序)评比中,居山东各城市的首位。

但是,“二元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深入,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角度看,更遗留下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必须努力解决。

(1)胜利油田生产的原油,主要由管道输往淄博齐鲁石化公司,在青岛荒岛码头或仪征长江码头出口,七五期间,为国家创汇40多亿美元。而在当地仅留下不能外运的稠油和高硫油,由当地乡镇企业处理。油田排放的大量CO₂未加利用,齐鲁石化公司的排污严重污染小清河的下流和莱州湾。

(上接第58页)

决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是大为有益的。这里有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过去重在防灾,现在防灾虽仍要放在首位,但应考虑在防灾的同时如何最大限度地兴利,最大限度地利用暴雨资源。

4. 建立暴雨洪水科研成果推广基金

目前国外的数值预报模式在我国的试验反比国内的数值预报模式试验容易。究其原因,国外的模式容易得到,国内的模式却很难得到。这就大大阻碍了暴雨洪水科研事业的发展。国内的模式是研制者花费几年、几十年,甚至毕生的精力研制出来的,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报偿。水利部、国家气象局若能建立暴雨洪水科研成果推广基金,把通过国家鉴定的、有价值的模式买下来,再在全国范围内免费推广,无疑会推动我国暴雨洪水科研事业的发展,所得到的社会、经济效益亦会远远大于投入。

(责任编辑 刘先曙)

(2)油气田的勘探尚在继续,现代黄河三角洲的合理土地利用必须统筹规划。例如1983年东营建市,由于考虑到西城区埋藏原油而在远离15公里以东处建设新区。又如黄河口的自然保护区也覆盖着埋藏丰富的油气田,如何协调应及早考虑。

(3)油田连年政策性亏损,难以为地方产业建设提供资金。地方经济不能从当地的资源优势中分享工业利益,造成区域产业结构的低水平和滞后,不能满足为石油产业提供广泛有效的服务,油田不得不自己搞“大企业,小社会”,加剧了“二元经济”的恶性循环。例如,为解决黄河北岸采油场职工生产生活问题,1983年建立东营市的同时,规划建设孤岛新城(仙河镇),目前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8个居住小区已有人口3万,服务于50公里半径内的孤东、孤岛及三外采油场,并建有1.2万亩耕地,1000亩虾池,3000头猪场,5万只鸡场、1000亩淡水养鱼池,保障油田职工生活,形成浅海油田开发的陆上基地。

(4)国家与地方合作产油、开发资源,有利于原油与废气的综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如沥青分馏、氢气及CO₂的利用。又如在盐滩利用CO₂培养螺旋藻被誉为“21世纪超级绿色食品”,每克轻粉相当于1公斤蔬菜,蛋白质含量高达60~70%,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酶和氨基酸。目前国内已建成螺旋藻工厂30多家,每年生产轻粉500吨左右,用于医药及保健食品。在东营市已具备充分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宜逐步形成规模生产。

(责任编辑 冷远猷)

(上接第61页)

陷也会日益突出,发达国家中产生毒品问题的种种因素将在我国逐步形成。那时,我国的肃毒工作将变得更为艰巨和复杂。为未雨绸缪,我们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也应该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文化缺陷有所警觉、有所防范?

提出这些问题,并非要主张放任毒品的泛滥。只是要提醒我国的政策研究部门注意毒品问题的复杂性,及早将中国的毒品问题研究置于一个较为广阔的经验背景中,以免重复他人走过的弯路。

(本文中有关我国和缅甸方面毒品情况的数据均引自云南省肃毒与发展研究中心、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肃毒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内部调研报告。)

参考书目

- [1](美)杰克·D·道格拉斯、弗兰西斯·C·瓦克斯勒著,张宁、朱欣民译:《越轨社会学概论》,P230~266,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石家庄
- [2](美)弗·斯卡皮蒂著,刘泰星、张世灏译:《美国社会问题》,P259~2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北京

(责任编辑 蔡德诚)